

红色地标中的党史故事

□文字整理：王万红 钱宝 任洋洋 □图片来源：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市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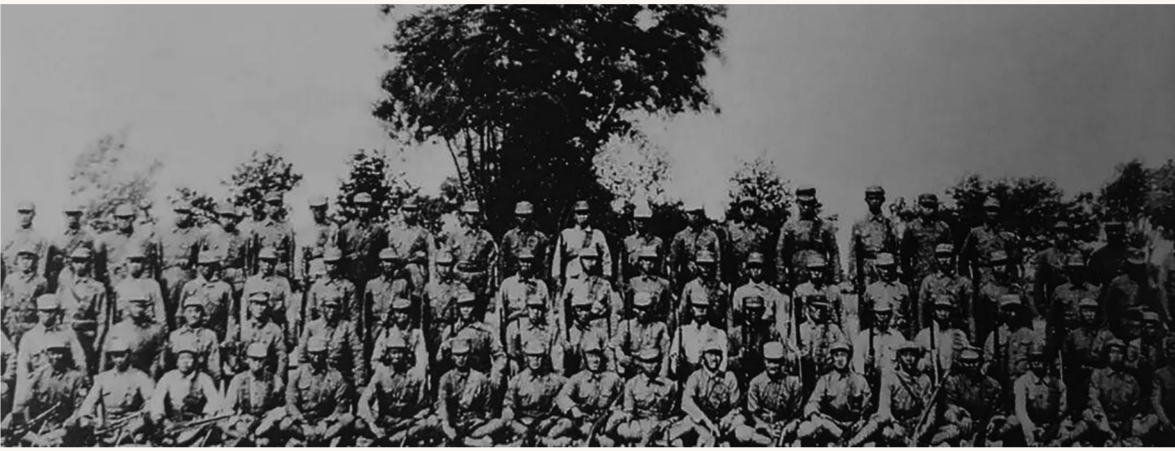
半塔保卫战：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之战

半塔集(今半塔镇)地处安徽来安境内,位于天长、六合、来安、嘉山(今明光)、盱眙数县交界,是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枢纽。这座寻常的皖东小镇,承载着抗战相持阶段反顽自卫斗争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记忆——半塔保卫战。它是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关键战役,也是新四军以弱胜强、固守御敌的经典红色战例。

1940年3月,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转战津浦路西,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趁乱纠集万余兵力,于3月21日向半塔集地区发起进攻,企图消灭留守路东的新四军部队,控制路东根据地。当时驻守路东的第五支队后方机关、作战部队及地方游击队仅2000余人,兵力与装备均处于明显劣势,部队分散部署在半塔集及周边多处阵地,形势十分严峻。

3月21日凌晨,半塔保卫战正式打响,战斗分为防御与反击两个阶段。战役初期,顽军一一七师从半塔东北方向偷袭镇内的教导大队。教导大队在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的率领下沉着应战,接连打退顽军两次进攻。当日中午,顽军集中兵力在炮火掩护下抢占半塔西北制高点光山,对半塔形成合围,同时火力封锁半塔与支队机关驻地苏郭的通路,妄图全歼半塔守军。危急关头,五支队副司令周骏鸣当机立断,亲率特务营二连从光山后侧隐蔽逼近,配合正面防守的教导大队两面夹击,一举夺回光山阵地。首日战斗中,留守部队先后击退顽军三次进攻,牢牢掌控周边所有制高点,保住了阵地间的联络通道。

此后数日,顽军持续向半塔周边各阵地发起猛攻。竹镇、石涧子、西高庙、乔王村等阵地先后告急,我方各部依托工事顽强阻击,以少量兵力牵制大批顽军。其中乔王村的民运工作组与当地游击队40余人,在民运组长兼游击队指导员刘洁(女)带领下坚守阵地一天一夜,牵制



▲半塔保卫战后,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十五团在津浦路东合影

了顽军一个团的兵力。经过三日激战,顽军攻势屡屡受挫,战场主动权逐渐转移到新四军手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密切关注战局,统筹协调外围部队向半塔集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也急令叶飞率挺进纵队昼夜驰援。挺进纵队一路西进,五日之内连战连捷,先后歼灭、阻击日伪军与顽军多股力量,于27日抵达竹镇、马集一线,直插顽军侧后。同日,路西回援主力在张云逸、罗炳辉率领下抵达半塔西南的张山集。顽军见新四军援军云集,已陷入夹击态势,于28日夜仓皇撤退。

3月29日夜,新四军各部转入全线反击。中路主力直插半塔东北追击溃敌,击溃前来掩护的顽军常备十旅,一路追至三河南岸;西北路部队追歼盱眙顽军秦霖部,收复涧溪、盱眙;东北路部队插入向坝、永丰镇,

追击至金沟镇;东南路挺进纵队与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收复竹镇等地,追击至三河岸边。

半塔保卫战共歼灭顽军有生力量3000余人,津浦路东各县土顽武装基本肃清,反动政权全部瓦解。这场战役是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创造了固守待援的防御作战经验,陈毅同志曾评价“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战役的胜利,既保障了路西作战的战略部署,粉碎了顽军东西夹击的阴谋,更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筑牢了根基。

斗转星移,半塔的烽火硝烟早已消散,但这场战斗所彰显的坚守无畏、团结御敌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曾褪色。如今的半塔镇留存着这段厚重的红色记忆,成为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铁军精神的重要阵地,那段浴血奋战、众志成城的历史,在皖东大地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半塔保卫战旧址

一篇经典报告的红色印记

▲1940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来安县大田郢作《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

来安县大田郢,是1940年4月至1941年1月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

1939年,为进一步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9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南下华中。同年12月初,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

此后,在刘少奇和中原局的领导下,新四军接连取得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保卫战、大桥集战斗等胜利,迅速打开了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

这个过程中,1940年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驻地半塔集大田郢举办的一次活动尤为值得铭记。当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大会上,刘少奇作了题为《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的重要报告。

他在报告中回顾了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和成就,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好、更强、更完善?他的目标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固然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中央与各级领导机关正确的领导,但是最基本的还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党员。”

那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党员?刘少奇提出3点要求: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共产党员是为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与解放而牺牲自己的。而在某些党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是一种旧社会的私有观念的残余,必须改正。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克服在某些党员中滋长的享乐人生观和对艰苦生活的厌倦心理,树立一心一意为了党和人类解放而坚决奋斗的坚定信念,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即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只有我们大多数党员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品质,努力前进,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党。

这3条标准,是革命战争年代衡量一名好党员的基本标尺。时代在变,但刘少奇在战火硝烟中强调的这些要求,其核心精神永不过时。新时代新征程上,重温这篇报告,就是要将其融入日常学习与党性锤炼,把“做一个好党员”的终生承诺转化为立足岗位、服务人民的扎实行动,为建设“最好的党”矢志奋斗。

中都遗梦:未竟的皇城



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一纸诏书震动天下,开国皇帝朱元璋要在家乡临濠建造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这意味着一座足以与应天府(南京)并称的都城,将从淮河南岸的旷野上拔地而起。

那是凤阳让整个中国侧目的六年。明中都置内、中、外三道城垣,占地五十多平方公里,集两千年中国都城建筑之大成。其皇城面积达八十四万平方米,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要大出十二万平方米。为了建造这座都城,朱元璋广集天下的能工巧匠和军民士夫,总数“不少于百万之众”;还遣使到番邦属国求取良材巨木,运送时需特制的三十二轮铁圈大车,以二百民夫之力方可驱动。

六年间,石料木材堆积如山,工匠军民涌入如潮,他们肩扛手抬、斧凿刀刻,把天子的梦想一寸寸夯进泥土,在大地上建造出都城的轮廓。凤阳从未如此热闹,也从未如此辉煌。然而,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在亲赴凤阳犒赏工匠后,于回京的当天便下诏,停建中都。史书记载,罢建的理由是“劳费”。六年之功,一朝叫停,如今六百多年过去,中缘由,再难查寻。但中都城的骤然停工,却实实在在给凤阳的发展砸下了一记重锤。

那些聚集到凤阳的工匠和移民,大多滞留不返。这座被寄予厚望的“帝乡”,没能迎来理想中的荣光。清代以后,县治被迁入皇城内,百姓也随之涌入,巨大的宫殿遗址被一点一点拆掘侵蚀。万历年间凤阳府人口超过一百二十万的盛况,早已只是史书中的一行字迹。

每次走进中都城遗址,我总不由思忖:朱元璋怀着对家乡深厚的感情,以府治设于凤凰山南之故,改濠州为凤阳。这个因天子赐名而获得“龙凤朝阳”之喻的地方,虽就此载入史册,却没能成为天子许诺的模样。都城也好,废墟也罢,帝王和他所创立的王朝湮没于历史长河,但那些在中都城残垣上筑屋、耕种、生息繁衍的普通百姓,始终守望望着这片淮河南岸的故土。

花鼓行吟:流浪的歌声

与中都城几乎同时诞生的,还有凤阳花鼓。小城里的花鼓曲调,无处不在。可以是老街门缝里的随心哼唱,可以是非遗展馆中的盛大表演。可是六百多年前,凤阳花鼓最初的诞生,却难掩一丝辛酸。

凤阳是个好地方

□作者:张莲芳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漫步在凤阳的街头,会听到不同的人反复提起——有花鼓艺人的后代,有博物馆的讲解员,有在洪武老街摆摊售卖梅鱼的老乡,也有在小岗村里追忆当年红手印的老人……每个人说起这句话,语调里都带着一丝难言的情绪,是对这座小城文化与发展的自豪,也夹杂着追忆历史而来的些许遗憾,似还能品出一抹凤阳人乐观底色下的调侃与自嘲。我因工作之缘来过凤阳多次,也好奇这语调背后的故事,但留下的只是些紧凑零碎的工作笔记。直到这次采风活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走入古城街巷,走进历史书卷,去找一找“凤阳是个好地方”,这句被用不同的语气说过、唱过、喊过、怨过,却始终像一个谜题的答案。

翻开凤阳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彼时这里是钟离子国,秦汉时置钟离县,隋唐以来一直都是州郡所在,以濠州治所载于青简,虽称不上什么名都大邑,但也绝非荒僻一隅。可凤阳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还要待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时。

花鼓,却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城的野心早已支离人声,而流浪的歌声,反倒成了穿越时间的活态遗产。这大概是凤阳最深刻的底色,也记载着历史的最大反讽——当皇权的辉煌化为废墟时,是那些最底层的百姓,用沿街行乞的歌声,为这座“龙兴之地”标注了真正的文化身份。

铁轨改道:错过的站台

清末民初的凤阳,又骤然错过了一次城市命运的转折。

作为中国早期建成的干线铁路之一的津浦线,规划之初,跨淮大桥的选址原本定在了凤阳县境内的临淮关。但经工程师实地勘测,临淮关一带地势低洼,夏季河水一旦泛滥有可能会漫过铁轨,进而影响行车安全。而上游约二十里处的蚌埠,地势较高,河床构成主要为坚硬的岩石,更适宜桥梁建设。于是,历经多轮的勘测研判,津浦线因大桥选址最终改道蚌埠。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蚌埠这座被铁路“选中”的小镇,一夜间从采蚌渔村变成了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火车在此停靠,商贾云集,人口猛增,很快跃居皖北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而被称为“抛弃”的凤阳呢?作为隋唐以来的州治所在,明清时期的凤阳府更是下辖数县,其中就包括蚌埠这一原本位于凤阳以西的临河集镇,却因一条铁路的选址改道,走向了不同的发展岔路。凤阳自此与交通动脉无缘,渐渐地落后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不过,在没能赶上火车的年代里,凤阳人靠

着自己的双脚不曾停止前行,远离了火车的汽笛和铁轨的碰撞,锄头落地、扁担吱呀,这里的人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延续着小城的烟火和生气。

红色手印:冬夜的春雷

百年之后,似乎错过了每一次转折的凤阳,却在安静贫乏的角落酝酿出了一声春雷。这一次,抉择命运的主动权被牢牢地握在一群来自凤阳最底层、最贫穷的村庄,几乎要被时代遗忘的农民手中。

1978年的冬天,凤阳县小溪河镇的小岗村,迎来了一个值得被铭记的夜晚。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十八户村民,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聚到一起,在“大包干”的秘密协议上按下了红色手印。

手印鲜红,却按得瑟瑟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出于畏惧。契约上一字一句写着,如果村干部因分田到户而坐牢坐头,其他农户要负责把他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这便是震惊全国“生死状”。十八个鲜红的手印,按下的不只是分田到户的诉求,也是一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更是凤阳人身处困境时,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魄开辟的一条新路。

那一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曾经唱着花鼓出门逃荒的小岗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砸碎了祖辈攥了百年的“讨饭碗”。于是那句“凤阳本是个好地方”,终于从一句唱词,在凤阳人的手中成了真。这是一块土地给予百姓的许诺——砸开枷锁,解放思想,土地便不会辜负耕种它的人。而这一次,许诺的

兑现不再依靠皇帝的心意或是铁轨的走向,而在于每一个凤阳人的耕作与收获。

余响:好地方的秘密

每每研读凤阳的历史,我总有感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从明中都的营建与废弃、到淮河的水患频频,从津浦铁路的规划与改道,到百姓流离行乞的花鼓,直到“大包干”的红手印,帝王功业也罢,城市命运也好,真正串起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砖一瓦、一锄一镰、一粟一薪,绵延千年,方有当下的凤阳。

它的确不如许多古城,有着一脉相承的悠久和完整。凤阳的历史交织着太多的大起大落,凤阳的地形又在多岗丘浅山和洼地滩涂之外,直面淮河,水灾频发,年年汛期都要承受洪涝的考验。明清两代,凤阳府的人口虽然一度增长较快,但频繁的天灾使得凤阳的百姓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凤阳地多不打粮,碾子一住就逃荒”,史书里多的是这样打油式的贫苦写照。

所以,凤阳并非史脉和地理上天生的好地方,也并非从古至今始终都是好地方。

但如今的凤阳,淮河安澜,百姓安康,县域经济跻身全省十强。站在当年按下红手印的小岗村的村口,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四季果蔬飘香;曾经冒险分田到户的农民,如今又率先走上土地流转、合作经营、民俗文旅的新路。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明中都城遗址、位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凤阳花鼓,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小岗村,这些都让凤阳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服务业也做到了有口皆碑,研学旅游,络绎不绝。

从修建中都的工匠,到哼唱花鼓的灾民,从悄然改道的铁路大桥,到颤抖着按下红手印;再到今天在田间、在厂区、在讲台、在机关忙碌的每一位普通人——凤阳人用双手、用汗水、用智慧,一点点将“好地方”从一句唱词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好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它不在山水的地势,也不在户籍的薄厚;它是百姓的生活,更是百姓的心意。

合上历史的一页页,从明中都鼓楼眺望凤阳城景,“凤阳是个好地方”就在眼前。原本因苦泪而起的唱词,经过人民的双手,蜕变为今日触手可及的欢歌笑语。

而我这个曾经多次来去匆匆的异乡人,终于在这座小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光里,听懂了唱词背后的深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